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30

2009年5月27日

\*\*\*\*\*

## 奪取寧夏計劃受挫原因探究

紅四方面軍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 夏宇立

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甘寧邊前後，中共中央經共產國際批准，為尋求戰略靠背，接受蘇聯援助物資，與張學良、楊虎城建立“三位一體”國防政府，發動抗日局面，組織發起了奪取寧夏戰役行動。可是，結果最終受挫。奪取寧夏戰役受挫，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件十分嚴重的事件，對中國革命的進程影響鉅大。它的受挫，是因為缺乏條件？缺乏有利戰機？還是根本沒有可能性？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麼，其根本原因究竟何在呢？

### 一、戰略決策上的先天性缺陷

奪取寧夏的決策上的先天性缺陷在哪里呢？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這一決策的過程。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陝甘支隊到達

陝北，與根據地內的紅十五軍團會師，不久毛澤東等人即開始了打通蘇聯的設想和運籌。可是，由於二、四方面軍還在遙遠的南方，紅一方面軍嚴重缺乏打通蘇聯的必要實力等原因，中共中央的這一積極設想，始終難以提上日程。直到 1936 年春天，南下碰壁的張國燾在包括紅四方面軍廣大幹部戰士的多方面壓力下同意北上，不久紅四方面軍又迎來了紅二、六軍團（旋即與四方面軍之第 32 軍組編成二方面軍），張國燾宣佈取消第二中央。紅二、四方面軍的共同北上，為打通“國際路線”創造了重要條件。也就在紅二、四方面軍準備北上的同時，兩廣事件（即西南事變）爆發，原在西北的胡宗南等部南下，這為紅軍的戰略行動提供了難得的契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奪取寧夏的決策正式出臺了。

這個決策的主要內容首先集中體現在 1936 年 8 月 9 日“趙天、趙來、趙古、趙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致“李毅”（張學良）信裡。其中說道：

根據二、四方面軍北上，西南事變發展，日本對綏蒙進攻等情況，我們認為兄部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 9、10 月間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面，而以佔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乘蔣注意西南無力北顧之際，我們的整個計劃須於 8、9、10 三個月完成其基本部分。……佔領蘭州是整個計劃的樞紐，其方法：用東北軍守城，紅軍二、四方面軍攻擊城外之毛炳文，勝利後，紅軍一部轉向蘭州上游給馬步芳以打擊，然後以一部取甘、涼、肅三州，一部取寧夏配合東北軍之一個軍出綏遠抵禦德王的進攻，樹起抗日的旗幟，紅軍之另一部，則在陝甘寧交界控制黃河東岸，並準備南下策應東北軍主力抵抗蔣之進攻。……東北軍以至少三個師好好地控制蘭州，如此

著成功，則可在今年秋天三個月內完成打通蘇聯的任務，我們必須堅信打通蘇聯是保證西北勝利（更不說全國勝利）的最基本點。而要在秋天打通蘇聯，不推遲到冬天氣候條件最困難時去做，則必須以佔領蘭州為樞紐。……關鍵全在乘蔣注意西南時，我們以突然的姿勢佔領蘭州，打通蘇聯，那時不管他來打也好，不來打也好，我們都有勝利的把握。<sup>1</sup>

此外，這個決策的主要內容又集中體現在幾天之後，即 1936 年 8 月 12 日“洛、育、恩、稼、懷、凱、澤”（即張聞天、林育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凱豐、毛澤東）致“朱、張、任”（即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電文中。該電規定紅軍的戰略步驟為：

甲，二、四方面軍盡可能的奪取岷州或其附近，作為臨時根據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兩岸之一段，俟部隊相當整理後，即以有力一部出隴西攻擊毛炳文，相機消滅之，目的在威脅蘭州，以便甲軍李忠（即東北軍于學忠 — 引者註）部三個師全部集中於蘭州為戰略樞紐，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擊河州馬步芳家鄉，目的在威脅青海吸引西路甘、涼、肅三州步芳兵力之東援，以便甲軍派出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於甲軍之手；一在消滅青馬一部促其與我講和，李毅現有代表在青馬處，以上是李毅與我商定之計劃。此外，再派較小一部拒止王均於西禮（即西和、禮縣 — 引者註）之線並派員與王進行外交，同時也對毛炳文進行外交，彼等均在極危懼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計劃大概以一個半月時間實現之。在此期間二、四方面軍努力解決人員補充與被服補充兩問題，以免進到甘北較貧苦區發生若干困難。

---

<sup>1</sup> 〈“趙天、趙來、趙古、趙東”致“李毅”信〉，中共中央檔案館第 6 卷第 30 號。

乙，完成上述任務之後，實現三個方面軍在甘北之會合，擴大甘北蘇區，準備進攻寧夏，這一步驟約在 10 月到 11 月實現之。

丙，12 月起三個方面軍中，以一個方面軍任保衛陝甘寧蘇區，並策應甲軍，對付蔣介石之進攻，以兩個方面軍乘結冰渡河，消滅馬鴻逵，佔領寧夏，完成打通蘇聯任務。<sup>2</sup>

這個電報，是在上面 1936 年 8 月 9 日致張學良信並取得他的同意後，中共中央給正在向甘南進軍的紅二、四方面軍的關於戰略方針的通告。這個電報，與上面那封信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是，在“打通蘇聯”的時間上，卻有較大的區別。9 日信上說的是“今年秋天三個月內完成打通蘇聯的任務”，“要在秋天打通蘇聯”，“不推遲到冬天氣候條件最困難時去做”；12 日電報中，則是“12 月起”“乘結冰渡河，消滅馬鴻逵，佔領寧夏，完成打通蘇聯任務”。恰恰在這一點上，至關重要，且問題嚴重，它是致命性的。

從 1936 年 8 月 9 日的信和 12 日的電文中，不難發現毛澤東戰略決策的先天性嚴重缺陷，它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寄希望於蔣介石嫡系不在西北；二是過分仰仗於甲軍（張學良東北軍）；三是時機定在“冰期”。

乘蔣介石不在西北，即是說，乘蔣介石因兩廣事變，無心西顧之機，主觀願望上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事實上紅軍三大主力將會師西北，蔣介石不可能等閑視之，他與中共和紅軍血戰了十年，如今在他看來，好不容易有了千載難逢一舉將其剿滅的極好機會，他決不會輕易丟棄。此時此刻對他來說，剿滅紅軍，其重

---

<sup>2</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635 頁。

要性蓋過所有的議事日程。並且，兵貴神速，他也絕不會錯失時機，不可能讓紅軍安然等待三個多月。至於與紅軍作戰所需兵力，在他那裡則更不成問題，當時他手中所握兵力，即使將解決兩廣所需放置不用，另外用以對付紅軍的兵力也綽綽有餘。所以寄希望於蔣介石在三個多月內沒有動作，顯然是對敵手的能量缺乏應有的到位的認識和判斷，對情勢的多變性、戰役的緊迫性，缺乏足夠的估計，因而一旦蔣介石方面情況有變，毛澤東的戰略計劃就失去了大前提，一切理想之花必將隨之凋謝。

那麼，張學良和東北軍又如何呢？不能否認張學良的聯共抗日、建立國防政府的積極性，然而，此時此刻的張學良卻遠沒有已經達到能夠當機立斷、義無反顧的程度。此時跟西安事變前夕的張學良尚不可同日而語。西安事變前夕，一方面，由於中共一段時間的感召的作用，另一方面，蔣介石的苦苦相逼、嚴重擠壓的進一步加劇，張學良已經沒有了獨自存活的生存空間，存亡關頭，後退無門，終於被逼上梁山，不得不與楊虎城攜手放膽一搏，這才造成了名垂青史的西安事變。張學良的最後決心，得益於蔣介石後來的西安之行中的嚴峻逼迫。然而，在目前，張學良那裡顯然沒有到達火候，他還抱有某種幻想。所以，其行為只能令毛澤東失望。後來，果不其然，紅四方面軍在甘南與敵軍打得熱火朝天，張學良那邊卻始終不見動靜，毛澤東不得不考慮紅軍獨自行動，奪取寧夏。

兵貴神速，戰機不會常在。不論是甲乙兩軍共同造成西北抗日局面，還是奪取寧夏，背靠蘇聯，都必須抓住蔣介石主力不在西北這個難得的時機。同時也應明白，這個時機不會很長，因為蔣介石也不會給你長時間的“預留”，相反他會千方百計力爭早日填補這個時間空檔，紅軍的勝利只能是與蔣介石爭時間搶速

度。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在毛澤東那裡，卻預留了那麼長時間。從正式計劃的 1936 年 8 月中旬到 12 月間，時間竟然長達四個月之久。為什麼要等待這麼長時間呢？在毛澤東的計劃裡，原來奪取寧夏（今銀川）的任務主要由一方面軍承擔。可是一方面軍卻沒有能力渡過黃河，同時因兵力弱小缺乏戰勝寧夏守敵的可能。不能渡過黃河自然戰役就無法進行，因為寧夏在黃河以西，奪取寧夏面前有天險黃河阻隔。紅一方面軍沒有造船能力，所以只有等候黃河結冰，而黃河結冰一般要到 12 月份。所以，只有耐心等待，等著踏上厚厚的冰層跨河而過的時候儘快到來。可問題是，這麼漫長的等待時間，會是什麼結果呢？這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夜長夢多，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戰機轉瞬即逝，兵貴神速的規律，是無法違背的。

毛澤東戰略決策上的天然缺陷，還表現出了相當大的頑強性和固執性。1936 年 8 月下旬，在眼看著張學良違背了與中共和紅軍達成的協議而按兵不動，紅軍被迫只有準備單獨幹的情況下，在 9 月 11 日，共產國際明確指示“在佔領寧夏區域後，將給你們幫助”後，<sup>3</sup> 在四方面軍領導人明確電告“黃河無論結冰與否，渡黃河技術上較易解決”後，<sup>4</sup> 在得知蔣介石已調重兵前來，其先頭已到咸陽的情況下，卻仍然不願意做提前迅速發起寧夏戰役

---

<sup>3</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693 頁。

<sup>4</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央徵詢對二、四方面軍行動意見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 年 8 月 23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659 頁；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傳編纂委員會：〈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關於戰略方針與行動部署的意見〉（1936 年 9 月 2 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174 頁；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93 頁。

的部署，而繼續初衷不改，繼續要等到“12月”結冰期，從而白白地耗去了數十天的寶貴時間，喪失了奪取寧夏的最佳時機。

## 二、作戰部署指揮上的多方面嚴重失誤

由於奪取寧夏戰役在計劃階段的先天性缺陷，致使對戰役的時機選擇中，在爭取戰役主動性和創造成功的可能性上大打折扣。不僅如此，毛澤東等最高決策者，在實施奪取寧夏計劃的作戰部署和指揮上，也發生了悠關作戰行動成敗的多方面的嚴重失誤。這些失誤的直接後果，亦是導致寧夏戰役受挫的重要原因。

### 1、毛澤東發生了一系列錯誤判斷

毛澤東的錯誤判斷，令人遺憾的是，它並不屬於偶發的個別情況，並不只是發生在“個案”上，恰恰相反，它有著多方位和連續性的特點，屬於典型的一系列誤判。

首先，對敵軍進攻時間上的誤判。

1936年8月，蔣介石解決了“兩廣事變”，並命令原用於解決事變的嫡系大軍胡宗南等部，迅速回兵西北，圍剿紅軍。可是，此時的毛澤東等人對這一動向不僅缺乏必要的瞭解，反而想當然地作出了嚴重脫離實際的估計。1936年8月30日，毛澤東以“育、洛、恩、博、澤”（即林育英、洛甫、周恩來、博古、毛澤東——筆者註）名義致電“朱、張、任”，對蔣軍的動向判斷為：“估計蔣在西南問題解決後出兵到西北時，尚有兩個月左右時間”，並以此來規定紅軍“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軍行動

方針”。<sup>5</sup> 可是，事實上蔣介石進兵西北十分迅速，至 1936 年 9 月 19 日，胡宗南軍第一師和第 78 師全部到達咸陽，第 43 師、97 師也隨後開到，並繼續西進。毛澤東等人估計的蔣介石“出兵到西北”“尚有兩個月左右時間”，可是，在蔣介石那裡只不過 20 天就做到了。

其次，對敵軍進攻的方式上的誤判。

面對國民黨軍胡宗南等部大軍雲集西北，並以西蘭通道為首要奪取目標的迅猛推進，1936 年 9 月 19 日，“毛、周、彭”致電“朱、張並致任、賀”：“目前對胡宗南不宜進行決戰，只須速進靜寧以西，佔領廣大陣地，讓他展開築壘。我在 70 天內逐步北移，至 12 月，一、四兩方面軍各以一部拒止南敵，各以主力北進攻寧，配合蘇聯幫助，奪取寧城（今銀川——筆者註），至明年春暖再行決定分路西進、南進、北進。”<sup>6</sup> 毛澤東之所以作出如此部署，是基於這樣一個判斷：胡宗南等部對紅軍採取的將是堡壘政策，步步為營，穩紮穩打，逐步推進。因而紅軍仍有步步抗擊，“70 天內逐步北移”，以堅持“至 12 月”的機會。然後，紅軍“各以一部拒止南敵，各以主力北進攻寧……”。

顯然，這種判斷，不符實際。因為，敵軍各路大軍並未“展開築壘”，其行動並非步步為營，而是迅猛推進。就在毛澤東等人此電後才十幾天，紅軍二、四方面軍即遭遇嚴重壓迫。首先是紅二方面軍在渭水以南地區處境危急，請求轉移至渭水以北。1936 年 10 月 2 日，“毛、周”電示“同意”二方面軍北渡渭河，“六

---

<sup>5</sup> 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年，第 574 頁。

<sup>6</sup> 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 593 頁。



日開始經天水以西向通渭轉移”。<sup>7</sup> 次日，又專電該部“宜乘胡敵尚未全部集中之時迅速開始轉移為佳。”<sup>8</sup>

同意二方面軍及時轉移，當然無可厚非。可是，面對這一情況，在毛澤東那裡卻又一次發生了誤判：“二方面軍渡到渭水以北之後，三個方面軍均處內線，主要的敵人胡、關、王、毛等軍，將首先依據渭水流域構成封鎖，然後將我壓至陝甘大道以北，再憑大道築起封鎖線來。敵之兩個步驟完成時間，大約需兩個月左右，如我能合力給敵相當打擊，還可延長些時間。”判斷二方面軍北渡後，蔣敵“將首先依據渭水流域構成封鎖”，此為第一步驟。之後實行第二步驟，推進至西蘭大道，“然後將我壓至陝甘大道以北，再憑大道築起封鎖線來”，“敵之兩個步驟完成時間，大約需兩個月左右”，“如我能合力給敵相當打擊，還可延長些時間。”顯然，“毛、周、彭”仍然堅持認為，敵軍是碉堡政策，穩步推進，步步為營。因此，前途和結局如何呢？他們指出一片光明，“從12月起，我之主力向北開展新局面，二方面軍即從內線拒止南敵至明年2月，以後我們進入新的地位，自可使用若干力量打出南面封鎖，轉向外線活動。”<sup>9</sup>

堅持認為此時的國民黨軍將實行碉堡政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法，顯然，屬於對戰局的錯誤估計，其思想還停留在對當年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戰法的記憶上。然而，軍無常勢，水無常形，此一時卻非彼一時。時間和空間發生了鉅大變

---

<sup>7</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四），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263頁。

<sup>8</sup> 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612頁。

<sup>9</sup> 毛澤東：〈“毛、周、彭”致“朱、張、徐、陳並致任、賀、關、劉”電〉，《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609頁。

化，而思想仍然停留在過去的階段，對紅軍目前的作戰，顯然是有害的。

敵軍迅猛推進，可是，面臨敵強我弱的嚴峻局面和敵軍的大舉進攻，毛澤東等人卻並未迅速警醒，反而繼續深陷誤判的泥沼之中。1936年10月6日，“毛、周”致電“朱、張、徐、陳、賀、關、劉”：“我三個方面軍在渭水以北集中後，胡、毛、王軍及東北軍均必須從新部署，需要相當時間。爾後，擬四方面軍主力仍在通渭、馬營、隴西川、會寧、界石地區，一個軍相機攻佔靖遠，佈置從靖遠以北至中衛段渡河事宜；二方面軍擬從通渭再轉進至通渭、靜寧、隆德、莊浪之間；一方面軍之一、二兩師，則將會寧、界石防務交給四方面軍後，轉至隆、靜大道以北，固原以南地區，使胡、王、毛、何、王（以哲）各軍，不得不展開築壘前進，我則利用時間休息兵力，待11月即可開始執行新任務。”<sup>10</sup>

毛澤東等人認定“我三個方面軍在渭水以北集中後，胡、毛、王軍及東北軍均必須從新部署，需要相當時間”，可是沒有多久，毛澤東的預言就被徹底打破。國民黨軍依仗五六倍以上優勢兵力和不可比擬的陸空裝備，多路迅猛推進，卻完全沒有“必須重新部署”，也並未“需要相當時間”，就在毛電次日（1936年10月7日）胡宗南之丁德隆師已進至離莊浪約20公里處的龍山、蓮花、隴城等地，接著就在幾天之內，敵各路大軍即已將其雄厚兵力推進到了紅軍防線面前，再過幾天後，即1936年10月16日，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即開始了向當面的紅軍陣地大舉進攻。因而，毛澤東所希望的敵軍“不得不展開築壘前進，我則利用時

---

<sup>10</sup> 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623頁。

間休息兵力，待 11 月即可開始執行新任務”的願景，不僅根本不可能出現，相反，由於紅軍方面被毛澤東預言中臆造的美好假象所牽累，甚至出現了急轉直下的困局。

其三，對戰況程度和作戰性質的誤判。

毛澤東的錯誤判斷，還發生在對敵我雙方即將面臨的戰況程度和作戰性質上。正是在胡宗南等蔣軍嫡系部隊大舉向西北進兵中，蔣介石制定了〈通渭會戰計劃〉，而國民黨軍的進攻行動正是“通渭會戰”計劃的具體實施。這個計劃的目的是要在西蘭通道地區，給紅軍主力以致命打擊，防止紅軍西渡黃河，進據河西地帶。為實施這個計劃，國民黨軍集中了胡宗南第一軍、毛炳文第 37 軍、王均第三軍及關麟征等部兩個師，另有東北軍于學忠、王以哲、董英斌等部七個師的策應配合。可是，就在蔣介石的惡毒陰謀圖窮匕見的時候，毛澤東等人又一次發生了誤判。1936 年 9 月 26 日，“林、張、毛、周、王、秦”致電“朱、張”：“確息：胡宗南部到咸陽未動，其後續尚未到齊。四方面軍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靜會定大道（即西蘭大道 — 引者註），不會有嚴重戰鬥。一方面軍可以主力南下策應，二方面軍亦可向北移動鉗制之。”<sup>11</sup> 總兵力達 20 餘萬的敵軍集中主要目標於西蘭大道，毛澤東等人卻估計這裡“不會有嚴重的戰鬥”，可見其作戰判斷與當前戰局是何等的南轅北轍，而後來在這一地域發生的空前慘烈的激戰和紅軍官兵大量傷亡，正是對這一誤判的最有力的證明。不僅如此，毛澤東的錯誤判斷，還在繼續發生著。

---

<sup>11</sup> 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 597 頁。

## 2、毛澤東選擇了錯誤的決戰戰場

毛澤東將紅四方面軍主力部署在西蘭大道，並非明智之策。當然不是說，這裡不可以成為戰場，而是說，從當時紅軍所處的敵情、我情、地形及面臨任務考量，這裡決不是於紅軍有利的戰場，更不是與優勢之敵作較長時間（兩個多月之久）的激烈較量的有利的主要戰場。

紅四方面軍進兵西蘭大道，原本是在甘南時由政治委員陳昌浩提議，並經“朱、張、陳”1936年9月13日電報中央，建議“三個方面軍協同作戰”，“一、四方面軍乘胡敵在西北公路（即西蘭公路——筆者註）上運動之時機，協同消滅其一部”。<sup>12</sup>

對於這一建議，“毛、周、彭”於1936年9月13日和15日兩次發出同樣內容電，表示：“我們意見四方面軍宜迅以主力佔領以界石鋪為中心之隆（德）、靜（寧）、會（寧）、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區，不讓胡敵佔領該線，此是最重要著”，“至一方面軍主力如南下作戰則定（邊）、鹽（池）、預（旺）三城必被馬敵奪去，於爾後向寧夏進攻不利”，“對東敵作戰宜以二、四方面軍為主力”。<sup>13</sup>顯然，毛澤東這一決策，與先前“朱、張、陳”的意見是有著質的區別的：前者“朱、張、陳”是四方面軍以一部兵力北上西蘭大道組織一個作戰行動；後者“毛、周、彭”是以四方面軍主力北上，控佔西蘭大道；前者是一、四方面軍配合作戰，後者為四方面軍獨立作戰；前者準備是短期行動，後者

---

<sup>12</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694頁。

<sup>13</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95頁。

為長達兩個月的行動。

1936年9月14日，中央又致電“朱、張、任”，在就佔領寧夏作出部署時進一步表示：“一方面軍主力9、10兩個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區，10月底或11月初開始從同心城預旺之線攻取靈武、金積地區，以便12月渡河佔領寧夏北部”；“四方面軍以主力立即佔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阻止胡宗南西進，並相機打擊之，10月底或11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以便12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二方面軍在陝甘邊積極活動，吸引胡宗南於咸陽、平涼之線以南地區，與四方面軍互相策應”。“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並不使妨礙爾後一、四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當一、四方面軍奪取寧夏時，二方面軍仍在西蘭大道以南，包括陝甘邊與甘南，擔負箝制敵軍之任務”。<sup>14</sup> 這裡，仍然規定四方面軍主力佔領、控制西蘭大道。

那麼，為什麼說西蘭通道地區不是一個好的戰場選擇呢？早在陳昌浩提出進兵西蘭大道與南下的一方面軍配合夾擊胡宗南的方案時，總指揮徐向前就有不同看法：“在西蘭通道地區與敵決戰，我們沾不到便宜”。“敵優我劣的態勢相當明顯。戰場選在西蘭公路附近，敵人運輸方便，調兵迅速，我軍南北夾擊不成，反會遭到敵人的左右夾擊。”<sup>15</sup> 因而提出了一個從永靖以南渡過黃河的建議。<sup>16</sup> 這一建議沒有被採納。可是，後來毛澤東等認

---

<sup>14</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96頁。

<sup>15</sup>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496頁。

<sup>16</sup>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496頁；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徐向前對作戰部署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陳昌浩電〉（1936年9月15日19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99頁。

定一方面軍不能離開海原、預旺南下後，陳昌浩的原擬“一、四方面軍主力南北夾擊敵人的計劃，就變成了四方面軍北進，在西蘭通道地區，獨立迎擊胡敵”，<sup>17</sup>顯然形勢將更加對紅四方面軍不利。

正是在與陳昌浩的爭論中，張國燾提出了從永靖、循化一帶渡黃河方案，這一方案正是來源於先前徐向前的建議，該方案在避免於不利地區與敵決戰外，也並不違背中共中央關於紅軍先取寧夏、後取甘西的戰略企圖。最後儘管這個方案由於中央的反對等原因最終沒有實施，但是，它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對毛澤東將紅四方面軍全軍部署在西蘭大道這一“不利地區的決戰”的保留態度。

紅四方面軍部署在西蘭大道，與優勢之敵長期決戰，顯然確非良策。那一帶由於周邊城鎮鄉村早已被敵軍重兵控佔，紅軍可獲取的地域有限，紅四方面軍進入之日，也就是鑽進敵軍包圍圈之時。那裡地處要衝，交通方便，便於敵軍快速增兵；那裡大多光山禿嶺，既不利於防禦，又不利於防空；那裡空間狹小，地域狹窄，人口稀疏，紅四方面軍四萬大軍的就糧和衣被補充亦是大問題。當時紅軍一般都是就地取材，那裡顯然缺乏條件。毛澤東許諾的“糧食不成問題”，<sup>18</sup>實際情況如何呢？不要去說後來四方面軍主力過河的河西部隊（三個軍）的糧食衣物沒有著落，就是留在河東的四軍、三十一軍部隊的糧食就難於解決，衣服更是挨到了山城堡戰鬥之後，才逐步補充。西蘭大道作戰時，許多幹部戰士仍然身著單衣，打著赤腳。毛澤東的許諾實際上放了“空

---

<sup>17</sup>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496頁。

<sup>18</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24頁。

炮”。

此外，在部署紅四方面軍於西蘭大道的同時，毛澤東將紅一方面軍主力作為將來的渡河攻寧部隊置於六盤山以裡、黃河以東，以同心、預旺為中心的地區，深處二、四方面軍的後方，與紅四方面軍的通、莊、靜、會相距六七百里，並拒絕南下西蘭大道與四方面軍聯合作戰，理由為“如南下作戰則定（邊）、鹽（池）、預（旺）三城必被馬敵奪去，於爾後向寧夏進攻不利”，<sup>19</sup> 可是，結果造成了該部既不能用於攻寧，又不用於打援（阻擊南敵），處於按兵不動，形成閑置狀態。然而西蘭大道上四方面軍卻孤軍奮戰，只能眼看著嚴重消耗。

### 3、毛澤東錯誤地實行“重點擊破南敵”決策

1936年10月上旬末，國民黨軍的圍剿攻勢發動在即，張學良秘密將蔣介石通渭會戰計劃通告中共中央，毛澤東等人在震驚中，決定提前發起寧夏戰役，並於1936年10月11日發佈〈十月份作戰綱領〉。這是一個在緊急情況中制定的綱領，存有因為國民黨蔣介石的迅速出手後的被迫反應的痕跡。綱領內容表明，雖然決定提前發起寧夏戰役，但仍和前幾個月以來毛澤東慣有的對敵情的嚴重性估計不足一脈相承，在其緊迫性上仍然有所保留。正由於〈綱領〉的發佈，寧夏戰役總算正式進入了計劃實施階段，不過，遺憾的是，它同時也標志著在出現嚴重敵情之前的那一段相當寬裕的寶貴時間和難得的戰機，由於遲疑猶豫，終於完全喪失。

---

<sup>19</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95頁。

但是，儘管如此，只要寧夏戰役從此順利發起，紅三十軍渡過黃河天險之後，毛澤東等再也不去發生不該發生的錯誤，那麼成功實施奪取寧夏計劃，仍然尚存相當希望。

〈十月份作戰綱領〉發出後，不論是朱、張、彭，還是徐、陳，貫徹執行的行動都是積極果斷的，特別是徐、陳所採取的一切決策和部署，對保障強渡黃河成功，十分得力和有效。1936年10月24日夜，紅三十軍經虎豹口渡口勝利突破黃河天險，寧夏戰役揭開了新的一頁，它有力地表明了紅軍從一個較長時間的渡河困局中終於獲得了可貴的生機。

獲悉紅三十軍成功渡過黃河的消息，“朱、張、彭”於1936年10月25日16時致電“中央軍委，賀、任、關、劉、徐、陳”：認為“控制西蘭大路10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務已大體完成。三十軍渡河成功，開闢了執行新任務的第一步勝利。”並為下一步作戰作出了部署：“一、四方面軍佈置我們原則上同意徐、陳24日的電所提意見，四方面軍主力（第三十軍、第九軍和第三十一軍三個主力軍——筆者註）應速渡河，搶佔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地區，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並對由蘭州北進敵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機動部隊於一條山、五佛寺之線，以便將來適時協助一方面軍在中衛、靈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驛前線部隊，儘量遲滯和吸引會寧方向之敵，該掩護部隊將來如必須渡河時，其一部可於掩護任務完成後，在靖遠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一方面軍主力應速集結同心城、關橋堡地區，準備渡河技術”。“朱、張、彭”還向中央軍委建議：“一方面軍將來主要在金積、靈武、中寧、中衛段渡河，以從五堆子



渡河為次要，必要時可以在五佛寺渡河。”<sup>20</sup> 當日同時，彭德懷也單獨致電毛澤東，表達了與此基本一致的寧夏戰役部署的意見。電稱：

毛：

（甲）三十軍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黃昏前可渡畢，第九軍繼續。估計蔣敵在我軍既已渡河，集中蘭州一部佔永登，可能一部向郭城驛、靖遠追擊前進。

（乙）已提出部署意見如下：

1. 四方面軍主力以三個軍渡河，兩個軍抗擊會寧之敵。
2. 二方面軍應逐漸向沛乾池抗退一部敵六營、七營以北。
3. 一方面軍主力仍集中王家團莊、高崖子、同心城，在金積、靈武之線為主渡點，中寧、中衛為次渡點。
4. 已渡河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後應向蘭州北岸永登、景泰擴大佔領區。

彭<sup>21</sup>

“朱、張、彭”電和“彭”電所表達的意見，實際上是朱、張、彭於打拉池相會中根據此前毛澤東等關於寧夏作戰綱領而具體商定的作戰計劃，無疑是正確的，假如不出意外，完成奪取寧夏的任務，不是不可能的。可是，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卻又發生了不該發生的情況，毛澤東突然改變作戰方針，實行重點擊破南敵，這個作戰方針的改變，立即將寧夏戰役推向危機。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何為“重點擊破南敵”？最能體現這一方

---

<sup>20</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39~840 頁。

<sup>21</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39 頁。

針要旨的是 1936 年 10 月 25 日毛澤東以“毛、周”名義致“朱、張、彭並致賀、任、徐、陳”電。電稱：

甲、根據敵向打拉池追擊及三十軍已渡黃河的情況，我們以爲今後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於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我處南北兩敵之間，北面作戰帶陣地戰性質，需要準備兩個月時間。不停止南敵，將使爾後處於不利地位。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於向北。

乙、因此，部署應如下：

（一）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後，兩軍迅速佔領黃河彎曲處西岸頭盧塘、三眼井堡、大營盤、大塘驛地區之樞紐地帶及向中衛方向延伸，偵察定遠營與中衛情形，準備第二步以一個軍襲取戰略要地之定遠營。

（二）四方面軍除渡河之兩個軍外，尚餘以九軍爲中心三個軍。二方面軍除派赴七營部隊外，尚余其主力。對南敵不須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內逐漸集結於打拉池南北地區，對敵則堅壁清野，誘其深入；對我則構築陣地，鼓勵士氣，待敵前進時消滅其三四個團，即足以停止南敵矣。

（三）一方面軍之主力於四方面軍兩個軍控制河西樞紐地帶後開始行動，以突然手段佔領金積、靈武地帶。徐、陳撥造船技術隊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屬之，迅速造船，準備渡河。

（四）在南敵確受嚴重打擊後，第九軍從中寧渡河。此時整個戰局進入以北面爲重點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軍之兩個軍與二方面軍全部防禦南敵，如何盼復。<sup>22</sup>

此電從整體上打亂了正常進行中的朱、張、彭和徐、陳關於

---

<sup>22</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39 頁。

寧夏戰役的部署。執行該電表達的重點擊破南敵這一方針的後果，也就是後來歷史上出現的那一頁：最終葬送了寧夏戰役以及河東反圍剿作戰的勝利希望。請看我們逐條剖析。

先看“甲”，“我們以為今後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於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於向北”（指奪取寧夏）。這裡毛澤東將寧夏戰役分作兩步，同時，將“擊破南敵”作為“北面作戰”的條件。“不停止南敵，將使爾後處於不利地位”。而對於北面作戰（奪取寧夏），認為：“帶陣地戰性質，需要準備兩個月時間”。——很明顯，對於奪取寧夏，這是一個等待的部署。換言之，毛澤東又一次將奪取寧夏的時間大大推後了。

再看“乙”下面對各部隊的具體“部署”。

其中“（一）”為部署渡河及規定渡河部隊在河西的任務。這裡有幾個問題：

其一，渡河後“兩軍迅速佔領”黃河西岸地區之“樞紐地帶及向中衛方向延伸，偵察定遠營與中衛情形”，“準備第二步以一個軍襲取戰略要地之定遠營”。很明顯，這裡對過河部隊面臨局面的考慮是不全面的。誠然，河西樞紐地帶必須控佔，定遠營和中衛情形也須偵察，但是，河西對蘭州方向的防禦也至關重要，卻沒有涉及。看來並未考慮。

其二，過河部隊（兩個軍）兵力有限，既須留一部兵力扼守西岸渡口，又須抽出一部兵力（一個軍）對蘭州方向防禦，還須控佔西岸樞紐地帶，哪里還有力量抽出一個軍襲佔定遠營？何況在寧夏還不為紅軍佔領，且佔據寧夏之敵馬鴻逵部沒有受到打擊和牽制的情況下，兩個軍的過河部隊以一個軍出定遠營顯然屬於冒險（從河西岸到定遠營約三百公里，其中的大部分路途處於騰

格里大沙漠與馬鴻逵部佔領區之間，在奪取寧夏之前，紅軍一個軍孤軍深入定遠營有被敵截斷和消滅的危險）。並且，紅軍在西岸屬於進攻的一方，立即就會遭遇河西守敵馬步青、馬鴻逵、馬步芳的拼死抵抗，而敵軍兵力雄厚，紅軍孤軍深入，勢單力薄，如果不繼續迅速投入兵力，紅軍在河西的主動權很快就會喪失。

其三，特別點出“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意思很清楚：九軍不要渡。應該說，幾個軍中，用哪個軍接渡最合適、最便當，前線指揮員最清楚，後方的統帥部不應過多干涉，可是毛澤東的不當干涉卻讓人難以適從。不讓九軍接渡，而用哪個軍接渡合適呢？毛澤東電文中沒有說。但事實上，根據當時情況看，除九軍之外，哪一個軍都不便利，都不合適。我們看一看當時四方面軍各軍所在位置就清楚。

毛澤東發電的當時（1936年10月25日），四軍在貢馬井（蘭州以東約40公里處）、葛家岔、新集兒（定西城以北約25公里處）一線防禦，該軍面臨數倍於己的敵軍的攻擊，防禦任務很重。同時，這一線陣地分別距黃河虎豹口渡口約120公里。<sup>23</sup> 沒有別的部隊前來接防，四軍是不能撤出陣地前往河邊渡河的。

五軍在會寧附近的三十里鋪休整。<sup>24</sup> 由於幾天前的華家嶺和會寧戰鬥中的較大損失，五軍作為“接渡”部隊顯然不適合，同時距離也在120公里外。

---

<sup>23</sup> 參見“徐、陳”1936年10月25日電：“四軍對新集兒、葛家岔線上，仍以三個團儘量制敵……十二師堅守現陣（即貢馬井——引者註），積極向蘭州方向活動”（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38頁）。

<sup>24</sup> 參見“徐、陳”1936年10月23日電：“五軍暫令在北三十里鋪休整，22日戰鬥正激，南輝犧牲”（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32頁）。

三十一軍一部在會寧三十里鋪防禦，另一部在會寧以東的青家驛、翟家所、張誠堡（距黃河虎豹口渡口 140 公里）阻擊敵人。<sup>25</sup>

九軍在哪里呢？1936 年 10 月 25 日，九軍作為機動部隊，已經全部集中在郭城驛及其附近。<sup>26</sup> 九軍下轄兩個師：第 25 師和第 27 師。24 日，軍直和 27 師進到郭城驛，而 25 師在向三十一軍交防後，也於 25 日進到郭城驛。郭城驛離黃河虎豹口渡口約 40 公里。顯然九軍接渡最便當。三十軍渡河成功後，25 日，徐陳電令“九軍決今夜跟進渡河”，<sup>27</sup> 九軍依令當日開到了河邊作渡河準備。就在這時，接到了毛澤東這一“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的電令。

如果要按毛澤東所說“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那就是首先九軍必須返回接防，完成雙方防禦陣地交接，渡河部隊再向河邊開進，而此時，不論是四軍，還是三十一軍，距離河邊都遠在 120 公里以上，部隊往返行動，沒有五天時間是不可能到達河邊渡口的。而此時紅三十軍渡河後，國民黨軍已經判明了紅軍意圖，出動大批飛機狂轟濫炸，阻止紅軍渡河，紅軍的有限船隻有被毀壞的危險，渡河必須爭分奪秒。所以，它恰恰

---

<sup>25</sup> 參見“徐、陳”1936 年 10 月 23 日電：“三十一軍火速抽出三個團……迅速開三十里鋪接五軍任務”，“其餘一個團位青家驛以北，兩個團在翟家所、張誠堡積極活動，以阻擊敵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33 頁）。

<sup>26</sup> 參見“徐、陳”1936 年 10 月 23 日電：“三十一軍……擬今晚或明天以三個團接 25 師防”，“九軍直屬、27 師明日進到郭城驛”（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32 頁）。

<sup>27</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38 頁。

表明毛澤東這一部署嚴重脫離實際，它的直接後果是造成指揮和行動的混亂。

其中“（二）”要求河東四方面軍三個軍以及二方面軍主力，“對南敵不須多加抵抗”，“逐漸集結於打拉池南北地區”，“待敵前進時消滅其三四個團，即足以停止南敵矣”。這裡，不難看出，毛澤東是將“打拉池南北地區”作為一個消滅敵軍“三四個團”，“足以停止南敵”的重要戰場考慮的，因而，為了達到作戰目的，對敵採取“堅壁清野，誘敵深入”的方針，對我實行“構築障地，鼓勵士氣”的辦法。

可是，問題恰恰就在這裡。當時，國民黨軍進攻的核心地區，就是黃河東岸靖遠渡口和打拉池南北地區。這一地區，對國民黨軍來說，你“誘敵深入”也罷，不“誘敵深入”也罷，因為屬於它必須攻佔的核心目標，它的大部隊都會進攻的。這裡離會（寧）靖（遠）大道不遠，交通方便。根據敵軍當時的能力，有道路交通，敵軍就不愁給養裝備保障，所以，在這裡，你“堅壁清野”也罷，不“堅壁清野”也罷，對它影響有限。這裡地處黃河東岸，地域狹窄，分頭從幾個方向前來的敵軍兵力集中，相互緊靠，加上飛機大炮的掩護，裝備低劣的紅軍難有消滅敵軍“三四個團”的戰機和條件，後來的事實就是證明：敵軍在進攻中幾個師相互緊靠，根本沒有留給紅軍以殲滅打擊的機會。相反，按照毛澤東的決策，紅軍反而自陷被動。因此，選擇打拉池南北地區“擊破南敵”的打算並不明智，打拉池南北地區並不具備紅軍大規模殲敵“三四個團”的理想戰場的條件。更何況，有多方面理由認定，蔣介石的大規模“圍剿”計劃也並非消滅了“三四個團”，就“足以停止”。所以，毛澤東以“打拉池南北地區”作為消滅敵軍，“停止南敵”的戰場，顯然脫離實際，它充分表明毛澤東

對南敵進攻估計不足，對河東戰局缺乏深刻認識和正確估量。

其中“（三）”是對一方面軍的部署，這一部署，是一個等待和“閑置”的部署。

其中“（四）”部署“在南敵確受嚴重打擊後，第九軍從中寧渡河”，“此時整個戰局進入以北面為重點之第二步”。按照重點擊破南敵的方針，如此部署，似乎合乎邏輯。可是，很明顯，它只不過是一個美麗的幻想而已。因為，事實上，按這一方針執行的結果，“整個戰局”的“第一步”“擊破南敵”尚難完成，又何談“進入以北面為重點”的“第二步”？此外，毛澤東大約更沒有考慮到由於河東敵軍的大舉進攻，渡口可能被敵佔領，河東河西紅軍的聯繫有被切斷的危險。

毛澤東此時作出重點擊破南敵的決策，對河東河西的作戰，存現了兩個毛病：一是誤判河西戰局，犯了輕敵的錯誤；二是對河東作戰方針失策，犯了急性病的錯誤。而這兩個毛病的嚴重後果，就是河東、河西雙雙失利。

重點擊破南敵決策，對紅軍的河東作戰，嚴重不利。重點擊破南敵的決策，來源於對河東敵情的嚴重性和作戰的較長期性缺乏必要認識，因而對當前戰局和作戰前景存在脫離實際的估計，表現出了濃厚的盲目輕敵和希冀速勝的急躁情緒，一廂情願地幻想迅速在西蘭大道及其附近給敵以嚴重打擊，“擊破南敵”，“一戰而勝利，則全局轉入佳境矣”，<sup>28</sup>而根本缺乏在強敵面前紅軍先退後幾步，誘敵深入，再給敵以打擊的思想準備。

這一決策提出之時，正是敵軍大舉進攻之初，其兵力集中，銳氣正盛；並且敵軍大軍蝟集在交通方便、投入和運兵迅捷的西

---

<sup>28</sup> 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638頁。

蘭大道及其附近，地形有利於敵攻而不利於我守，毛澤東要求紅軍於此時此地與敵決戰，以圖“擊破南敵”，“一戰而勝”，迅速將“全局轉為佳境”，顯然，紅軍難以達成這一作戰目標，其決策明顯存在問題。因為從雙方兵力、戰場指揮、天時、地利、道路、民情等各方面的因素看來，河東紅軍不論是在西蘭大道，還是海原、同心地區，都沒有擊破敵軍的可能。

那麼，對付河東蔣介石的大舉進攻，正確的辦法是什麼呢？正確的有效的辦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即紅軍主力（四方面軍全部和一方面軍或者四方面軍主力）迅速渡河進佔寧夏，並出定遠營接取援助物資，而對付河東敵軍的重兵進攻，可先採取堅壁清野，誘敵深入的方針，以一部兵力節節抗擊，待敵分兵深入根據地後（當地的地形、道路、村落、民情等環境條件決定了敵軍不可能持久大部隊集中行動，將不得不分散行動），紅軍再抓住戰機實行各個擊破。其實，早在紅三十軍發起渡河作戰之初，徐、陳就已提出了這一建議，這是戰勝河東國民黨軍的唯一正確的戰法。如果再加上取得了蘇援武器裝備的河西主力紅軍回師大舉反攻，河東的蔣軍的圍攻不是不可以打破的。這就是“後發制人”的辦法。徐、陳的正確建議，朱、張也深表贊同，<sup>29</sup> 並電報

---

<sup>29</sup> 〈徐向前、陳昌浩關於四方面軍今後行動與兵力部署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10月24日），中央檔案館紅四方面軍電報，軍委檔案館複製件第319卷第173~174頁；〈徐向前、陳昌浩關於引敵於蘭州遲滯會（寧）定（西）敵人之兵力部署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電〉（1936年10月26日），中央檔案館紅四方面軍電報，軍委檔案館複製件第319卷第186頁；〈徐向前、陳昌浩關於執行寧夏戰役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並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賀龍、任弼時電〉（1936年10月27日），中央檔案館紅四方面軍電報，第287卷22號；〈徐向前、陳昌浩關於四方面軍對目前行動部署之意見致朱德、張國燾及軍委電〉（1936年10月28日7時），中央檔案館紅四方面軍電報，第287卷26號。



毛澤東等，<sup>30</sup> 卻不幸被毛澤東所否定。

其實，弱軍對付強軍“後發制人”的辦法，毛澤東剛剛在“紅大”作過的演說中，就有精彩的論述。毛澤東說：“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者則堅決反對此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所謂‘禦敵於國門之外’”。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劈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sup>31</sup> 然而，可惜的是，毛澤東此時採取的首先擊破南敵的方針，說到底，其實質與被他所批判的“軍事冒險主義者”的“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如出一轍，也與那為他所嘲諷的“劈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的《水滸傳》中的洪教頭的手段毫無二致。其結果，不言而喻。

首先擊破南敵決策的錯誤，表現在對河西作戰的部署上，則根本違背了進攻作戰的基本原則。寧夏戰役發起後，紅軍面臨河東河西兩面作戰，河西處於紅軍的戰役目標地域方向，作戰的重點理應在河西。同時，河西紅軍處於進攻的一方，也必須集中兵力，迅速行動，制敵機先，搶佔有利位置，爭取殲敵機會，打破敵軍的防禦體系，保持戰役中的主動權和創造戰役勝利的條件，——這是進攻作戰的基本規律。正是遵循這一進攻作戰的規律，1936

---

<sup>30</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朱德、張國燾關於全軍部署意見致中央軍委及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0月28日19時15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49頁。

<sup>31</sup>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3頁。

年 10 月 24 日，在紅三十軍渡河前，徐、陳提出建議：“渡河成功時，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向發展。”<sup>32</sup> 當日夜，三十軍渡河成功。25 日，紅軍總部“朱、張”用 158 號電令批准了徐、陳上述建議。<sup>33</sup> 朱、張在批准上述建議的同時，又和彭德懷聯名於當日 16 時致電“中央軍委，賀、任、關、劉、徐、陳”通報了這一部署。<sup>34</sup>

就在前線指揮員，按照進攻作戰原則，加大後續部隊的投入力量，以便乘勝猛烈擴大戰果，一鼓作氣爭取戰役的勝利的關鍵時刻，毛澤東的“重點”“擊破南敵”的作戰方針和決策出臺。這一決策的出臺，實質上是對河西作戰來了一個緊急剎車。由於這一決策的作戰重點在河東，對河西的兵力投入嚴格限制，必將導致河西部隊難有作為。

在此情況下，著眼於迅速奪取寧夏的大局，指揮河西作戰的徐向前、陳昌浩一再據理力爭，“為著迅速實現寧夏戰役計劃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軍渡河起見，提議四方面軍全部渡河，以一個軍對待蘭州之敵，四個軍迅出中衛、寧夏，並放船到大廟及中衛，迎接一、二方面軍。”“四方面軍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護顧此失彼，不但開路、掩護、決戰都難完成，甚至根本影響戰役計劃，望重決速示，萬勿坐失良機。”徐、陳的意見，得到了朱、

---

<sup>32</sup> 徐向前：《徐向前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3 年，第 42 頁。

<sup>33</sup> 〈徐向前、陳昌浩關於引敵於蘭州遲滯會（寧）定（西）敵人之兵力部署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電〉（1936 年 10 月 26 日），中央檔案館紅四方面軍電報，軍委檔案館複製件第 319 卷第 186 頁。

<sup>34</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提出作戰部署致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電〉（1936 年 10 月 25 日 16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39 頁。

張的贊成和支持。“三十一軍即跟三十、九兩軍後面，迅速渡河。”“若謂目前重心在擊破南敵，停止敵之追擊，事實上，四、三十一兩軍亦難有保證的完成任務，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礙堅壁清野，以四軍牽制敵人，也可得到爭取時間之利。”“取得物質後，在以主力回擊深入之敵，那就更有把握了。”<sup>35</sup> 可是，最後都一再遭到了毛澤東的否決。

由於毛澤東堅持重點擊破南敵的方針，拒絕採納紅四方面軍全部過河，特別是最終否定紅三十一軍過河的意見，致使河西作戰由於兵力所限，遭受嚴重影響。儘管後來紅五軍在渡口遭敵進攻為保護船隻的緊急情況下攜船渡過西岸，也加入了河西作戰行列，但是，畢竟五軍不是主力，以前基本沒有擔負四方面軍中的大仗硬仗惡仗任務，同時五軍人員少（約三千人），且剛剛在會寧遭到重創，亟需休整，與近八千人的紅三十一軍不可同日而語。由於河西兵力有限，戰局無法正常開展，毛澤東規定的“襲取定遠營”任務，顯然無法完成。在此情況下，毛澤東指示河西部隊“休息待機”，<sup>36</sup> 可是在敵軍後援迅速集結，敵我漸漸衆寡易位，強弱易勢之後，所謂“休息”只能是望梅止渴。1936年11月4日8時，“徐、陳”致電“朱、張”，再一次對寧夏戰役提出意見，表示：“目前戰役計劃已決定，務請速戰，遲則敵齊頭難決戰。關麟征師、馬鴻賓師既有令開石咀子，如不速戰則該兩敵如先我出中衛、寧夏後，使寧夏戰役更難速完成。我方情況實不允許久控制現地區等待配合右岸行動。”“軍隊指揮貴在統一

---

<sup>35</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46頁、第849頁。

<sup>36</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55頁。

集中，或軍委或總部或前敵機關統一行之；各方面軍須嚴格服從指揮，打破本位主義。”“建議四、三十一軍成一×由肖、周（三十一軍軍長肖克、政治委員周純全——筆者註）指揮擔任一路。如不決戰，可令其過河增我方；如只使任掩護的消耗戰，於決戰時則分散箝制，似不能鼓起指戰員的滅敵雄心。”<sup>37</sup> 徐、陳的苦心孤詣得到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不多久，河西紅軍漸漸由進攻變為防禦，由主動變為被動，將勝利希望化作了泡影，出現了徐、陳先期所警示的“坐失良機”的不幸結果。

#### 4、錯誤的作戰方針下的海打戰役又失之於致命粗疏

本來，遵照原來的〈十月份作戰綱領〉，朱、張、彭於打拉池商定了寧夏戰役作戰部署，紅軍一、四方面軍集中主力準備渡河作戰。1936年10月25日，紅三十軍勝利渡過黃河。可是，這時，毛、周突然改變原定作戰部署，將以奪取寧夏為重點改為“擊破南敵”為重點，這種關係全局的突變，不僅使準備進攻寧夏的紅軍總部和四方面軍領導人不知底裡，困惑不解，同時也令參與制定寧夏戰役計劃的紅一方面軍領導人彭德懷措手不及。正是在這種錯誤的戰略決策出臺的大背景下，彭德懷被任命為前敵總指揮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並被指定“全戰役須掌握在你一人手裡”，倉促組織海（原）打（拉池）戰役。<sup>38</sup> 由於此戰役指揮者一再誤判敵情，並在戰役的打擊對象、戰場選擇、決戰時機以及

---

<sup>37</sup> 文中符號“×”為電報原文缺字代替（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3頁）。

<sup>38</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55頁。

紅軍參戰部隊的調動指揮等一系列問題上，表現了致命的粗疏，出現了多方面的嚴重失誤，最終導致海打戰役流產。海打戰役的流產，以及隨後前敵總指揮部組織指揮的一系列戰役的流產，使毛澤東等人所謂“擊破南敵”，“一戰而勝利，則全局轉入佳境”的希望徹底落空，也最終推動了運籌良久的奪取寧夏計劃破滅。<sup>39</sup>

### 三、諸多消極因素的綜合效應的促成

導致奪取寧夏計劃的最終失敗，除了上文所述的決策缺陷和指揮錯誤的根本原因外，其他的諸多消極因素也值得我們注意。這些因素，歸納起來，總共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外在方面；一是內在方面。正是這內外諸多消極因素形成的合力，又推動了寧夏戰役計劃失敗。這些消極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一、蔣介石的迅速出擊，重兵壓境。對於蔣介石將重兵出現在西北，出現在紅軍發起的寧夏戰役的前線，以及由此給紅軍造成的不利局面，毛澤東和中共最高層不是沒有考慮過。但是，蔣介石的神速進兵西北，迅捷在紅軍的寧夏戰役之前現身，卻完全出於中共最高層和毛澤東意料之外。正是由於蔣介石的迅速進兵和此之前的毛澤東遲疑不決，優柔寡斷，以致紅軍錯失良機。

二、陝甘寧邊根據地的困境和危局。當時，中共和紅軍所據陝甘寧根據地地廣人稀，物資匱乏，衣食俱缺，紅軍三個方面軍總共六七萬人馬面臨的是不僅戰時補給供應無力，即使是平時的必須開銷也難以作為。儘管張、楊曾秘密給予了些許接濟，共產

---

<sup>39</sup> 中共巴中市委宣傳部、市委黨校、市委黨史辦公室主編：〈海打戰役流產原因〉，《川陝革命根據地創建 75 週年歷史研討會論文集》，2007 年 12 月。

國際也有部分資金援助，但杯水車薪，並無實質好轉。在蔣介石於 1936 年 10 月 16 日發動進攻後，短短 20 來天，毛澤東等即已喪失堅持信心，於 1936 年 11 月 8 日匆匆制定〈作戰新計劃〉，準備轉移遠離而去。<sup>40</sup>

三、紅軍和張學良、楊虎城“三位一體”的破局。這之前，“三位一體”並不牢固，中共和紅軍對張學良的影響，時間不到一年，對楊虎城的溝通則更為有限，以致在 1936 年 8 月 9 日中共中央四常委致李毅的信中還表現出了對楊虎城的深切疑慮和嚴格防範。<sup>41</sup>同時，在蔣介石進入西北之前，張、楊對紅軍奪取寧夏計劃始終處於猶豫徘徊之中，而並沒有見之於實際的積極的行動；由於對張、楊的統一戰線工作還處於秘密狀態，並主要局限於張學良部的高層，其廣大的中上層及基層並不瞭解已經與紅軍達成了默契，所以在蔣介石重兵集結和嚴令之下，張、楊各部又不得不參與和配合對紅軍的進攻。這一參與和配合，只能是“三位一體”的解體，只能與為創立“三位一體的國防政府”之目的而奪取寧夏目標漸行漸遠。

四、國際及周邊局勢的變化導致共產國際和蘇聯援助方向的改變。由於受寧夏戰役發起時間的延宕以及毛澤東突然改變作戰重點的嚴重影響，西渡黃河的紅軍不能及時到達接受物資地域，結果第一批蘇援物資被馬家軍掠取。此後，又由於定遠營及其周邊局勢的變化，共產國際和蘇聯不得不從安全方面考慮而改變援

---

<sup>40</sup> 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 652~655 頁。

<sup>41</sup> 此信中認為楊虎城和陝軍“動搖”，內稱：“對陝楊須有必要的準備工作，但此公有名的動搖者，恐怕只在我們有堅決的抗日發動，並打通了蘇聯之後，他才會堅決的跟我們來”（〈趙天、趙來、趙古、趙東致李毅信〉（1936 年 8 月 9 日），中央檔案館第 6 卷第 30 號）。

助方向。如此，也進一步推動了中共最高層放棄奪取寧夏行動。

這些，都是外部消極因素的主要方面。而中共黨內和紅軍內的鬥爭陰影，則是作為內部消極因素的一個重要方面而存在。

不可否認，寧夏戰役存在著中共黨內鬥爭陰影下的決策背景。一年前，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發生嚴重黨內分歧，從而導致中共中央率一、三軍單獨北上，張國燾擅自率紅四方面軍南下，並另立中央。張國燾南下碰壁後，經共產國際干預和中共中央爭取，以及紅四方面軍廣大幹部戰士的覺醒和鬥爭，張國燾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並同意北上。雖然張國燾表示“急謀黨內統一”，服從於共產國際的裁示，並率紅四方面軍北上，但是中共中央與張國燾矛盾的陰影並沒有消除。這種黨內矛盾和不團結的消極因素，明顯地表現在毛澤東等部署奪取寧夏的戰役行動中。毛澤東為什麼一再要將奪取寧夏定在冰期以後？為什麼一定要佈置四方面軍在西蘭大道上堅持兩個多月之久？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敵軍將大舉前來，中央決定提前發起寧夏戰役，可是，為什麼紅三十軍剛一成功渡河，毛澤東卻突然改變此前朱、張、彭根據〈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制定的切合實際的寧夏作戰部署，而實行重點擊破南敵？這些決策失誤的重要誘因究竟在哪里？

毛澤東的決策行為的確讓人十分困惑：奪取寧夏，兵貴神速，卻偏要堅持到12月份？一支疲憊、劣勢之軍在於我不利的西蘭大道上堅持兩個多月，意味著什麼？他不明白？奪取寧夏之戰，紅軍屬於進攻一方，理應作為戰役重點，集中兵力，速戰速勝，他真的不懂？河東作戰，紅軍以弱敵強，以小搏大，卻不願誘敵深入，而偏偏乘敵兵力集中，銳氣正盛之時與敵決戰，與敵硬拼，求“一戰而勝”，他何出如此下策？這些問題，其實並不複雜深

奧，毛澤東也並非不知兵者，那麼究竟原因何在呢？看來“功夫在詩外”，一切從黨內鬥爭出發，為了爭取黨內鬥爭的強勢地位，不惜在決定紅軍生死存亡的戰局上出險著下險棋。

毛澤東過分施心計於對紅軍指揮權力之奪控。本來，頒佈〈十月份作戰綱領〉的當天（1936年10月11日），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剛剛要求“為統一指揮起見，請朱張兩同志以總司令、總政委名義，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sup>42</sup>紅軍總部朱、張就在前線，統一在軍委領導下，指揮三個方面軍的作戰，順理成章。這之後，朱、張秉承中央指示，根據〈十月份作戰綱領〉和中央軍委寧夏戰役的意圖，和彭德懷商定了戰役計劃和部署。根據這一部署各部隊的行動，迅速走入正軌。應該說，戰局的發展是正常和健康的。換句話說，當時紅軍的指揮與部隊行動關係是協調和平衡的。這種協調和平衡標志著紅軍總部朱、張和四方面軍領導人還存有部分指揮權力，然而，這在毛澤東那裡是不允許的，於是，首先擊破南敵的決策出臺了。這一決策的出臺，表現在紅軍部隊的指揮關係上，最鮮明的特點，首先就是對紅四方面軍指揮權力的分割。由於要重點擊破南敵，紅四方面軍被分成兩半，要求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留在河東，而留河東部隊不歸徐、陳指揮。第二步，設立前敵總指揮部，河東四方面軍部隊統歸前敵總指揮部彭德懷指揮。第三步，明確要求“朱、張不得干預”對河東紅軍部隊指揮。正是經過這樣幾個步驟，紅軍總部朱、張不僅對其他方面軍部隊，就是對四方面軍部隊的指揮關係全都被切斷，紅軍總部完全被架空，毛澤東通過前線的彭德懷基本控制了指揮權。毛澤東在成功獲取軍事指揮權的過程中，朱德、張國

---

<sup>42</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14頁。



燾不僅並無絲毫的抵制，相反還多方給予配合。正是在這種指揮關係的變動中，嚴重地影響了寧夏戰役的開展，或者說，正是毛澤東為了從根本上改變指揮關係的企圖，又成為了寧夏戰役流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並且，在對朱、張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指揮權力的排斥和剝除的過程中，不僅毛澤東本人對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多有猜疑，同時，受其影響，紅一方面軍中彭德懷等更是表現了一種在嚴重敵情面前於團結對敵作戰極為不利的過激行為，在紅軍內部領導層中，造成了一種不應有的敵對情緒。

早在會寧會師之前，在致毛澤東等人電文中，彭德懷就多有對張國燾等四方面軍領導人的不當言詞。會師之初，彭德懷又向毛澤東等建議，將張國燾調離前方去陝北後方，毛澤東感覺目前採取此項辦法，不夠策略，因而沒有採納。“若於此時調其來定邊，則太勉強，彼可有理由推諉不來。”<sup>43</sup>

1936年10月25日，紅三十軍渡河成功，朱、張、彭於打拉池聯名致電軍委和二、四方面軍，通報了關於奪取寧夏的作戰部署，就在同一時間，“彭”又專電致“毛”。<sup>44</sup>該兩電都表達了根據〈十月份作戰綱領〉原則而確定具體作戰部署的意見，從電文的內涵上看，部署意見是一致的，說明他們正是朱、張、彭於

---

<sup>43</sup> 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洛思博澤”致“彭”電〉（1936年10月14日24時），《黨史參考資料》，1981年第1期。

<sup>44</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提出作戰部署致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電〉（1936年10月25日16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39~840頁；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彭德懷關於一、二、四方面軍渡黃河及抗擊胡敵之部署致毛澤東電〉（1936年10月25日16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39~840頁。

打拉池會商後達成一致的結果。

可是，1936年10月2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毛澤東在此電中警示彭德懷，“國燾有出涼州不願出寧夏之意，望注意。”<sup>45</sup>本來，毛澤東此言純屬毫無根據的猜測。然而，在彭德懷那裡，卻迅速發生了作用。第二天（27日），他給了毛澤東等一份極為出格的電報。電稱：

毛左聶：

甲、大帥以各種方法使我不能與徐陳見面並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的計劃，更企圖將總部移乾鹽池檯堡使育英不能與其他幹部會談。

乙、西北局有劇烈鬥爭，朱德、傅鍾、陳昌浩三同志擁護中央，張全無進步代表了一條明顯的取消主義道路。

丙、本日決去找徐陳面談。

丁、前25日前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後才給我看，一種陰謀的強姦式的，以後聯名電報作無效。

彭<sup>46</sup>

其實，彭德懷這一電報，只要稍作分析，不難發現，多屬不實之詞。

其中“甲”：指張國燾（文中“大帥”）“以各種方法”使他“不能與徐陳見面並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的計劃”，這裡說的“各種方法”，但並未列舉究竟哪些方法。可是，事實上有一點是清楚的，徐、陳沒有與彭見面，不是因為張的阻攔，而是當時嚴重戰局下的缺乏可能性，何況徐、陳沒有離開指揮崗位與彭

---

<sup>45</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44頁。

<sup>46</sup> 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黨的文獻》2002年第3期，第91頁。

會面並非不正常。首先，根據中央軍委提議，朱、張、彭打拉池“會面”，並沒有要求徐、陳參加。其次，當時的作戰環境，也決定了徐、陳不可能脫離指揮崗位，遠距離前往與彭德懷見面。1936年10月20日彭德懷到達打拉池。當日朱、張根據早就與毛、周及彭電商約定好的計劃率紅軍總部由會寧出發前往打拉池，23日，朱、張、彭及徐海東在打拉池相會。朱、張離開會寧前，鄭重向徐、陳交待，前線作戰事宜，由徐、陳負責，按〈十月份作戰綱領〉的要求，機斷處置。<sup>47</sup> 22日，蔣介石下令向西蘭大道的紅軍發起總攻，當日，徐、陳率方面軍總部離開會寧，抵甘溝驛指揮作戰。此時的紅四方面軍既要向東向南阻擊敵軍，又要向西組織渡河作戰。連續幾天，多次出現危局，徐、陳親臨前線指揮，十分緊張繁忙。而會寧到打拉池150多公里，甘溝驛到打拉池120公里，朱、張20日一大早由會寧出發，23日下午4時到達，緊趕慢趕用了四天時間，試想戰場危急關頭，徐、陳能撂下指揮擔子遠離部隊遠離前線（一來一去最少需要八天時間）去會彭德懷嗎？再說朱、張已經去了打拉池，朱、張與徐、陳在作戰意見上本來就是一致的，有必要紅軍總部和方面軍總部主要領導人全部都到齊嗎？說“以各種方法”“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的計劃”，更屬毫無根據，電文中也無法拿出證據。至於說“更企圖將總部移乾鹽池檯堡使育英不能與其他幹部會談”，更是何從談起。林育英由陝北經寧夏向西而來，打開地圖就知道，打拉池在甘肅境內，它東面約30公里處是乾鹽池，乾鹽池東面15公里處是檯堡，檯堡以東北約40公里是關橋堡，正是林育英來的方向。論說張將總部向檯堡方向移動，正是前往迎接的舉動，卻怎麼成了企圖“使

---

<sup>47</sup>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508頁。

林育英不能與其他（四方面軍）幹部會談”呢？事實上，四天後（1936年11月1日），在關橋堡，朱、張與林育英相會，氣氛甚歡，張國燾也並沒有阻攔林育英會見其他四方面軍幹部。

其中“乙”：指“西北局有劇烈鬥爭，朱德、傅鍾、陳昌浩三同志擁護中央，張全無進步代表了一條明顯的取消主義道路。”西北局內的確曾經有過分歧，有過鬥爭，但並非彭發電時日，而是在早已過去的9月中旬，其分歧和鬥爭的焦點也並非在是否擁護中央上，而是在紅四方面軍北上西蘭大道是否有利上，實質上是作戰部署上的不同意見。<sup>48</sup> 所以彭德懷的劃線和貼標籤，誰擁護中央，誰“全無進步”“代表了一條明顯的取消主義道路”，顯然屬於把錯了脈。

其中“丙”：說“本日決去找徐陳面談。”這不過是表一個態度而已，而在當時是絕不可能兌現，或許也無意真正兌現。

其中“丁”：指稱“前25日前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後才給我看，一種陰謀的強姦式的，以後聯名電報作為無效。”

“朱張彭”與“彭”於1936年10月25日16時各自發出的電文，作戰部署是一致的。<sup>49</sup> 原因在於10月23日朱、張到達打拉池與彭會見後，曾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達成共識，並無分歧。10月24日，“朱張”致電二、四方面軍領導人並報中央軍

---

<sup>48</sup>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495~499頁。

<sup>49</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提出作戰部署致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電〉（1936年10月25日16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39~840頁；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彭德懷關於一、二、四方面軍渡黃河及抗擊胡敵之部署致毛澤東電〉（1936年10月25日16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39~840頁。

委：“我們昨 16 時到打拉池與德懷、海東晤談……關於根據新任務由德懷同志提出之戰役計劃要旨，我們完全同意，正根據今日情況研究具體化之方案。再行電告。”<sup>50</sup> 25 日，紅三十軍渡河成功後，“朱張彭”與“彭德懷”發出的電文內容基本相同。這決不是偶然巧合，而是事前根據毛澤東兩次電文內容討論後，統一認識的結果。可是，當天，“毛、周”作出了“第一步應集注意力於擊破南敵”，“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於向北”的部署。這是一個大變化，與“朱張彭”、“彭德懷”25 日 16 時的作戰部署都不同。“朱張”接到“毛周”電文後，於 27 日 5 時電令“徐、陳並報毛、周”：“毛、周電令目前作戰重點，系注重擊破南敵，停止（敵人）追擊。我各部即遵照這一指示執行。”並具體調整了作戰部署。而彭德懷則不顧他於 25 日 16 時單獨發給毛澤東的、與“朱張彭”電文內容一致的那份電文，於 10 月 27 日致電毛澤東，強調“朱張彭”的聯名電報，“發後才給我看，一種陰謀的強姦式的”。“朱張彭”電究竟是不是“發後才給”彭看的，目前尚無其他證據。但是，既然具體作戰部署是他在打拉池與朱、張共同商定的，既然 25 日 16 時各自發出的電報表述的均為基本一致的部署，即使“朱張彭”的電文發後才給彭德懷看，也決談不上什麼“陰謀的強姦式的”。事實上，毛澤東在周恩來及彭德懷不在場甚至不知情的情況下，用“毛、周”或“毛、周、彭”名義擬發電文，也屬經常，總不能也說是一種“陰謀的強姦式的”吧？

彭德懷這樣的電報，並不是個別現象。筆者查過這個時期的電文，發現在彭德懷那裡，它經常發生，其言辭也很過分。比如，

---

<sup>50</sup>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35 頁。

1936年10月30日，彭德懷致“毛周”電：“張對打擊胡敵，始終是動搖的，企圖以四方面軍先取（遠）方（物）資後再說，以一方面軍與胡敵周旋，削弱力量，（他）好說話。”<sup>51</sup> 這種過激言論，在下面別人那裡也同樣存在。例如：10月27日，一位高級幹部向中央報告：“張以各種方法破壞打擊追敵計劃，此點不僅證明他怕胡宗南，更包含著繼續向甘涼肅以至新疆逃跑之實質及一貫路線。”<sup>52</sup>

“動搖”、“逃跑”、“各種方式破壞”等毫無根據的指責越多，小動作越多，內部拆臺越厲害，顯然越不利於對敵作戰。軍事行動講究“天時、地利、人和”，大敵當前，理應團結對敵，然而，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的確在一定範圍內出現了很不和諧的氛圍和很不正常的狀況。很難想像，這種狀況下，紅軍的戰略行動，會出現上乘的表現，美好的結果。但是，另一個情況也值得注意，筆者在遍查這個時期的電報和其他文獻中，不僅在四方面軍領導人那裡，就是在張國燾那裡也都沒有發現此類言論，確實很令人詫異，似乎不正常。其實，它又是正常的，此時的張國燾既揹著一個“分裂”的包袱，同時又寄希望於北上途中任弼時提議的經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同意召開六中全會解決團結問題的願望，因而作出團結的姿態，又不在意料之外。

紅軍奪取寧夏計劃受挫的影響是極其嚴重的。它不只是使紅軍的大發展藍圖嚴重受挫，同時亦使紅軍的戰略格局遭受嚴重擠壓而出現了十分嚴峻的狀態，又使長征到達陝甘寧地區的紅軍三

---

<sup>51</sup> 竹鬱：《被否定的歷史和被歷史的否定》，內部刊本，第40頁。

<sup>52</sup> 徐占權、徐婧：《長征中的重大戰略抉擇》，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97頁。

大主力遭受嚴重損失。它還極大地打擊和傷害了中共中央決策層的情緒，動搖了堅持陝甘寧根據地的信心，甚至被迫準備採取遠走他鄉繼續轉戰的步驟。奪取寧夏計劃受挫，又為過河紅軍部隊以後在河西走廊的艱苦作戰和最後失敗種下了禍根。

奪取寧夏受挫，造成了中國革命前所未有的困局。若不是不久後發生的西安事變，使奪取寧夏計劃失敗造成的惡果，得到了相當的補救，那麼，中國革命的艱難前途將會添加更多的曲折。但是，由於西安事變的鉅大積極影響，使奪取寧夏計劃受挫後的消極後果得到了及時的掩飾，以致奪取寧夏計劃流產後問題的嚴重性，長期以來都被人們所忽視，以致在歷史和反映歷史之間出現了鉅大的反差。因此，將這段歷史從西安事變的蔭庇中平攤到歷史的陽光下，實事求是地進行梳理，顯然是十分必要的。